

敦煌女儿

(报告文学)

——一生守候敦煌莫高窟的樊锦诗

□刘建林



“我白天想敦煌，晚上梦敦煌。80岁了，还能做敦煌的事！”这是一位年过八旬老人的心声。在如今浮躁的社会里，人们贪恋大城市的繁华与热闹、便捷与富裕，一个个费尽心力、绞尽脑汁涌向了北上广。可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有那么一群人，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需要紧紧地连在一起，倾其一生，只做一件事。

1963年，北大毕业的她，响应“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的号召，来到了几千里外的敦煌莫高窟，开始守护敦煌。这一守，青丝变白发，就是一辈子。她就是1938年出生、被人们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她的傻，在如今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没法儿接受的。原本生在大城市，名校毕业，却只身前往人烟稀少、生活艰苦的大漠敦煌。其中的原委，要从她1962年初见敦煌说起。

在上海生活时，父亲常常带着她去博物馆、展览馆，欣赏艺术大师作品，也曾有幸看到敦煌壁画美术展览。从那些灵动作品中，她感受到了幻化的美，便有了“一睹敦煌真面目”的念想。24岁那年，她作为北大学生因实习不远千里来到敦煌，美梦成真。当敦煌艺术作品真正呈现在眼前时，她和同学们被震住了。“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嵌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眼前，令人惊心动魄。”时至今日，她依然记得当时的震惊之情。在那个黄沙纷飞的戈壁大漠中，她被那些千变万化的壁画迷住了。看了一个又一个洞窟，琳琅满目、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使她满足、震撼，沉浸在洞内神仙世界、艺术殿堂，全然忘记洞外风沙走石、黄土漫天，甚至洞外的一切。

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而言，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同样使她震惊。住的是土房、吃的是杂粮，缺水断电，洗澡成了极为奢侈的一件事。没有商店，听不到广播，看的报纸也是十天以前的。除却生活条件艰苦以外，工作环境也是异常恶劣。最使她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攀爬挂在悬崖峭壁上的蜈蚣梯。一根绳子直上直下在悬崖上吊着，沿绳一左一右扶着脚蹬子——这是进入洞窟的唯一途径。每次爬时，她都心惊胆战，跟要猴子似的，在梯子上左晃晃、右晃晃。为减少恐惧，她改了早起喝水习惯，整个上午不用上厕所，每日便能少爬几次。

虽然她怕了那里的艰辛生活，可心里仍深爱着那些塑像和壁画。1963年，她大学毕业后时，敦煌研究所向学校要人，名单里有她。父亲担心身体羸弱的女儿难以适应荒漠，便写信恳请学校，不要让瘦弱女儿去那么艰苦的地方工作。可是，那份信却被她悄悄扣了下来。“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敦

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他们在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地位，却为了保护敦煌艺术，心甘情愿过着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受前辈精神感召，她又无反顾踏上开往大漠的列车，来到了戈壁深处的莫高窟。

这次，她做好了扎根大漠的准备，吸取实习时留长发洗梳难的教训，干脆剪了个极短的运动员头。时至今日，她依然留着短发。那时，敦煌保护研究所对外联系仅有一部手摇电话，可往往是断断续续，通讯极其困难，几乎与世隔绝。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筒照明，上厕所也要跑好远的路。对此，她坦诚地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是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然而，这没能动摇她对敦煌艺术的炽烈迷恋。

一年后，在武大工作的恋人彭金章来到西北大漠看望她。没想到，昔日未名湖畔诗书散步的娇俏女子，在日日漫天黄沙中变得异常坚韧。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彭金章如是说：“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新，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他们的爱情，无死去活来，亦无轰轰烈烈，犹如山间清泉，自然而然而地从生命相遇中流了出来。1967年，他们在彭金章武汉大学的宿舍，举行了简单婚礼。自此，他们成了牛郎织女，一个在武汉，一个在敦煌，开始了长达19年的两地分居生活。每隔一两年，她有20天探亲假，便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她至今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意，尤其是对孩子。1968年11月，她与彭金章的第一个孩子在敦煌出生了。得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彭金章挑着小孩衣服、鸡蛋等，坐火车再转汽车，一路颠簸，赶到敦煌，已是一周后了。

在看到风尘仆仆、挑着扁担的丈夫时，感动和酸楚一齐涌上了心头，她喜极而泣，滚烫的热泪止不住地流。儿子未出满月，彭金章假期已满，又赖着不走磨蹭了几天。可是，学校那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催。即便有万般不舍、千般不忍，彭金章只得留下她一个人照顾儿子，踏上返校列车。

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儿子。56天产假结束后，她又不得不把儿子每天捆在蜡烛包里，留在家。孩子一天天长大，蜡烛包渐渐捆不住了，她又把被子叠放在床沿，防止孩子跌落。每天上工，她都提心吊胆，生怕一个人在家的孩子发生什么意外。所以，每次下班走到家门口，若是能听到孩子哭，她那颗悬着的心就踏实了。若悄无声息，她的心会提到嗓子眼，紧走几步，先把门推开一道缝，看看孩子在不在。挨到4个月大时，她实在无暇顾及，无奈把儿子送回丈夫河北老家，由姑姑抚养。等第二个儿子出生后，姑姑已无法抚养两个孩子。老二便在她身边长到了3岁。可是在敦煌眼瞅着孩子教育成了问题，无奈只好送到武汉。尽管她在同事眼里成了少有柔情的女人，但一谈起孩子，她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

1986年，彭金章终是妥协，放弃武汉大学事业，来到了敦煌。如今，他们相濡以沫。她依然为敦煌四处奔波着。彭金章已退休在家，默默地支持着她。爱情有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凄苦，也有梁山伯祝英台的美好，可是他们的爱情，从生活的美好中流了出来，是一对神仙眷侣。

内心纯净的人，才能把现实的不堪幻化为一种坚毅的美好。“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她瞅着日益毁坏的壁画、塑像，心急如焚，寝食难安，日日夜夜思索着保护之法，一门心思扑在了研究保护的“门道”上了。是啊，莫高窟是古代东西方文化在敦煌交融的璀璨结晶。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之间的中西交通。敦煌作为这条“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又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点。如此厚重珍贵的文化历史遗产，怎能毁掉？有一年的夏天，她一进洞窟，就连着打了几个喷嚏。洞内空间狭小，随着游客增多，充斥着游客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和汗味。“洞受得了吗？”从此，她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拿出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照片和现在对比，发现100多年间变化很大。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褪去。壁画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葆青春。”面对这种老化、分化的趋势，她很伤感，也很焦虑。“我们只能延缓，不能逆转。”于是，她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为留住那种精湛技艺呈现的美好而夜以继日地忙碌。

1998年，她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此时，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搞得如火如荼，莫高窟的游客数量也与日俱增，从1979年只有1万人，增加到了20万人。最让她头疼的事，不是游客多了，而是在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下，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莫高窟是人类的无价之宝，我心想一定要保护好。万一有闪失，我就是罪人。”她虽是人微言轻，可不停地四处奔走，给人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平息了一场上市风波。现在说起来，她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你，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将自己的生命融进了敦煌，爱上那里的苍凉和静寂，习惯了敦煌的深邃与自然，也早已把生命中最美的时光埋在了那片淳朴的黄沙里。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戈壁大漠的风沙已将西部的粗犷、豁达揉合进这位江南女性的内心。曾经上海女人的小资情调，早已演化为如今的西北大漠的厚重。

她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就有敦煌莫高窟，这是一种幻化美。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应该把这种美展示给公众。可是，每一个游客的到来，都会影响洞窟内温度、湿度、空气的变化，而这会加速壁画的退化和盐化。她只能试着控制游客，钱可



以少挣，但壁画不能不保护。她搞数据实验，找到了洞窟所能承受的临界线。然而，那些个脆弱的壁画承受能力很有限，统计出来的人数少得可怜。“不能阻挡观众不让看。人们应该享受到这样珍贵的、杰出的文化遗产、成果，应该能欣赏它的价值，它的精美，我们如果要限制，这个不讲道理。”她如此这般认识这个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了电脑，“那时我就感觉，莫高窟有救了。”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她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65岁的她脑洞大开，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造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搞一个“数字敦煌”。那个数字敦煌建成后，游客可以在尚未入洞窟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

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如同在石窟中游览一般。而在这项巨大工程落地的时候，她已经79岁了。

半个世纪守候，是一种心灵的契合，更是一种人生的际遇和命运的安排。年轻时的她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上站”。但现在的她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争了。”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这样传开了。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做事不留情面。因此，有人背地里骂她是个“死老太婆”。然而，在人都走光的深夜，她却常常独自在办公室里，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着那些尖利刺耳、不中听的话。她说：“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我‘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在这些时光里，在遥远的戈壁大漠深处，风沙日夜雕刻着敦煌莫高窟的容颜，也雕刻着她守护千年惊世的荣耀和艰辛。曾有不少人问她，在敦煌待得住吗？她用质朴纯真的语言回答：“人都快忙死了，忙得一场糊涂。至于什么人待不住，肯定是待住了，而且还安下心来静静地做这个工作。”劳累奔波半个多世纪，她无怨无悔。她穷极一生守望着莫高窟，在她的生命足迹里，品到了坚毅，读到了专注，也深深感到那个瘦弱而不伟岸身躯里，包裹着一颗高贵倔强的灵魂。

心路

踏寻古营盘

□梁桐桐

古营盘，其实是察哈尔右翼前旗玫瑰营镇的一个行政村，村名的由来已无从考证，但就其地理位置观察，这里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则无悬念。

印象中的古营盘村位于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与察右前旗的地缘结合部，散落的土建民宅不太规则地坐落在这里，家家户户的土房子周围用黄土拍起半身高高的围墙，算是一家一院了。这里与周围的村落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却牵动着我们40多年的情思，魂牵梦绕地总想找机会到此去踏寻，去走访，去故地重游。

今年“八一”前夕，我和同年入伍的战友聂喜云从河北来到内蒙古，约定到集宁西山的褶皱里，去追寻保卫北部边疆的青春记忆。

那座山沟，是我们青春生命的起点。眼前的古营盘村已今非昔比，宽阔的柏油马路从村边穿过，村民们盖起了宽敞的砖瓦房屋，只有远处已无人居住的几间破旧土房，像个老人坐在那里静静地叙说着当年。

站在村边极目远眺，却看不到当年那凸起的山丘，难道是我找错了地方？在我们犹豫地对话时，站在一旁的一位村妇热情地告诉我们：你们找的地方没有错，只是那个山丘的上好青石，前几年已被挖成了大坑，现在已看不到当年的模样了。说话间，一位壮年汉子从街头走来，问清我们的来由后，主动要为我们带路到原址踏寻。在路上，老乡对我们说：“看见你们就觉得亲切，当年解放军就住在我家，我还吃过你们包的饺子，可好吃呢。”我说：“解放军和老百姓本来就是一家人啊。”我们说着走着，眼前出现了一个被挖得很深的山石坑，老乡指着那里对我们说，这就是你们要找的施工场地。

我站在那里，看着残留在地下的碎石，望着不远处尚残存的百姓土房遗址，按照方位，仔细搜索着过往的记忆，认定老乡带我们去的地方，就是当年我们战备施工的碎石场。倏忽间，那难忘的一幕幕掠过眼前。45年前的初春时节，北疆大地仍是残雪一片，我所在的连队奉命到古营盘村北山丘处采石砸石子，保障集宁老虎山隧道施工建设。记得连长的队前动员简短有力，内容就是：战士面前无困难！总结起来一个字，“干”。连队根据总体要求为各排下达了每日砸石方数指标，各班排又为每个战士加码下达了指标进度，一句话，就是要超额提前完成任务。

战士们穿着大头鞋，戴着帆布手套，一人一把铁锤，身背一壶清水，从山里的营房甩开脚板子，排队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古营盘村边山丘下。年轻的战士们似乎个个都是多面手，经骨干简单示范开山砸石子要领后，大家操枪弄炮的双手，很快就掌握了碎石技巧，摆开了战场。当时没有机械碎石设备，只能靠战士的双手将山石用钢钎采下，再用扁凿整子劈开后，战士们再将石块搬到各自的砸石点，用穿着大头鞋的双脚夹住石块，再用铁锤粉碎，一锤不行，再砸一锤，直到一锤一锤将石头砸成标准尺寸的石子。坐在背阴处还有残雪斑驳的山丘上，迎着呼啸的山风，战士们比学赶超，虎着劲儿地超额完成任务。渴了，喝上一口水壶里已经冰凉的水；热了，用满是石尘的双手抹一下额头汗珠，画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猫脸儿。天气一天天转暖，先穿着的大头鞋换成了解放鞋，仍然用双脚夹着石块碎石。一次，举起的锤头重重地砸在了我的脚侧面上，那个疼痛可想而知。当时战士们砸脚伤手的不计其数，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走下施工火线的。

那时每天夕阳斜照时分，当看到我们超额砸出的碎石子，经过立方丈量后，在古营盘工地装上军汽车团配属的解放牌卡车，运往边城重地老虎山隧道，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能为祖国在边疆筑筑打不垮、炸不烂、四通八达、能打能防、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我们流血出汗，奉献青春和力量很值得。每每想起，没有懊悔，只有珍贵与自豪！

繁星

我是乡愁树上的一枚红枣

□陈晔

我是乡愁树上的一枚红枣
枣树下长大
也曾经是小小的枣花
也曾经默默无闻无光无华
不知道山外面的世界是啥
也曾经没有方向
是枣树上的红枣 点燃理想之花
小小枣花 在枝头慢慢发芽

我是乡愁树上的一枚红枣
枣树下是我的老家
经过风吹雨打
经过干旱风沙
我们的生命朴实无华
我们是生命的铁杆庄稼
我们的骨子里有河的柔顺 山的高大

我是乡愁树上的一枚红枣
枣树下留着我们儿时的小脚丫
一枚甜甜的枣儿
一枚脱离了乡土的枣儿
一枚离开了又怀念浓缩成乡愁的枣儿
红枣的味道 已经 融入血脉
乡愁树上 思乡的花籽经常开花

就做一枚乡愁树上的红枣儿
无论到哪里 无论黑头发
枣树下，永远是我们的老家
我的故事 有着 花香和颜色
我们的梦想 就从枣林里 出发
我们一起在乡愁里嚼着脆枣回家

书评

讲好中华人物故事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历史人物传记《郭守敬》读札

□赵会喜

间断地筛选、梳理和订正，进而准确简洁地注释或者描述，而勘验、认知、逻辑与艺术创作之间的诸多问题，也都体现出对作家的判断力与批判力的考量。

宁雨以独特的语言打开方式、以取精用弘之笔法潜心创作了这部历史人物传记。文本以小切口、小角度还原了元朝社会历史的恢宏气势，以想象之真实完成了以郭守敬为代表的时代群体形象的塑造，彰显了家国情怀和民族自信力。这就涉及传记写作中虚与实的问题，关于邢州石桥重建、西夏治水、奉命修历、四海测验、灵台坚守、通惠工程诸多“实”的问题，越是接近客观越是体现出艺术之真，进而体现出作家对于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控制力，而将人物写得生动鲜明，还应从日常生活行为的细节出发，这又反映着人物的心理、思想、性格、命运，关切着人物的生活状况、遭际和社会时代的变迁。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其一，作者的语言取其散文神采，嵌以文言句式，时而又融合河北中南部民间俚语，以贴近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为人物立传找到自治性的叙事语言；其二，这些细节的真实源自虚构的艺术力量。一般来说，历史

文献、典籍、史料、考据等仅提供“信史”及真伪梳理概况等方面的资源信息，而历史往往将真实遮蔽起来，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往往隐藏起来，那么让人物可感可信，就需要作家对人物的日常生活、人情世故、交际游历等方面展开艺术想象。所谓讲历史人物故事，既属于时代的故事，又属于个体化的故事。如，与虚照禅师路遇场景的设置，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理应存在这种现实的可能性，但事件本身于史无可考。作者通过这种情节预设，人物就有了历史活动空间，从侧面折射出时局动荡。如，紫金书院种菜和辨识菜蔬情节，史料上应有记载，但要叙述为相对完整的情节，仍需要情节方面的艺术想象空间，这个看似不经意的情节，却加深了郭守敬、子聪和王恂之间的友情，为他们日后的密切合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说明至少在这个时期从西域引进了恰玛古。于此，作者与历史人物融为一体，这里面既包含着崇敬之情、历史之责，又彰显以“有我”观“无我”的大情怀和大境界。

此外，兴修水利、编修历法关乎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关乎国富民强之道。当时，修历核心人员还是郭守敬在

紫金书院求学时期的同窗好友，至修历之时，同窗皆已官至高位。官至太子赞的王恂除了举荐郭守敬参与修历之外，又举荐了少数辞官的儒士衡来主持修历，文中有“至于是否要制造新浑仪和大批量量天的仪器，是否需要郭守敬加入修历的核心团队，他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虑”。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奉命修历这项工作的实际以郭守敬为代表的团队，唯有通过相互协作才能够完成，作者要呈现的亦是以郭守敬为代表的时代群像。

据作者讲，这部历史人物传记根据出版社的要求进行了删订，共删去了近两万字。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突出了“信史”部分，而其文学性有可能削弱。作者在文中对时代背景、个人际遇、家庭境况及其他可以展开的地方，仅以简笔带过。但从整体上看，这并不影响展现这部人物传记在当下写作意义上的开拓之力，尤其是在当前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作者对历史人物进行深度挖掘与历史抒写。这既是作者创作中华先贤人物故事的文艺初心，也是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使命担当。

讲好中华人物故事，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是文艺工作者的职责。河北作家宁雨创作的历史人物传记《郭守敬》（中华书局2020年9月出版），是“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丛书（第二辑）中的一本。对作者来说，这部传记既是展现对历史人物写作意义上的跨越，也是对从燕赵大地上走出的中华先贤人物郭守敬的历史追思。

郭守敬出生在宋、金和蒙古汗国历史交错的动荡时期。该作品创作难度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作家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寸如何定位评价，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与人物真实，这就要求对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做到精巧地处理，这就要求在“信史”和创作中寻找准确的历史文化路径；其二，从政治意识形态上讲，元代是宗教繁盛的时代，而占主导地位哲学是宋代兴起的理学，传统儒学、道家哲学、禅宗佛教和蒙古族信奉的萨满等皆兼收并蓄，由此，还关涉修历的核心人物许衡，他接受的是朱熹之学，并以之用于朝廷政治。这就意味着政治生态、思想意识和民间风俗交叉混杂，科学和巫术共存，是当时较为普遍的现象，并从侧面说明天文、历法等科学研究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其三，涉及古代官职、历史典籍、古今地名、水利工程体系、天文台建筑与历代量天仪器及相关文献资料，这些都要要求作家在创作之前进行不